



主编 周宪 许钧

20世纪的两位

知识分子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萨特 与 阿隆

[法]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著
陈 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世纪的两位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主编 周宪 许钧

萨特与阿隆

[法]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著
陈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法)西里奈利著;陈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14-02972-3

I .2... II .①西...②陈... III .①萨特,J.P.
(1905—)——生平事迹②阿隆,R.C.F.(1905—)——生平事迹 IV .K83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071 号

- 书 名 20 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
著 者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译 者 陈 伟
责任编辑 戴亦梁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通韬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页 2
字 数 28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972—3/G·978
定 价 2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知识分子译从总序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说起来这话题还真有点儿沉重。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的时代图景日趋明晰。“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回到了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

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像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

F007/0P

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专业社会中职业分工越加细密,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毋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中,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此话真矣!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遇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据此,我们选编了这套译丛,旨在透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

讨论,寻找一些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诚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我们也未必赞同诸种理论观点,不过,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

周 宪 许 钧
2001 年 6 月于古城南京

目 录

本书内容及作者简介	1
引子 此一时彼一时	3
第一部分 火山口底部的历史	16
序言 故事在预备班开始	19
第一章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或纯真年代	34
第一部分结论 倒退着走进历史	89
第二部分 风暴中的一代	91
第二章 历史的觉醒	93
第三章 世界大战中的两位知识分子	152
第三部分 30 年的战争	203
第四章 大分裂	205
第五章 冷战期间	256
第六章 从阿尔及利亚到越南	310
尾声	364
第七章 日落,印象	365
结束语 本世纪没有知识分子吗	381

本书内容及作者简介

两位哲学家都出生于 1905 年,1924—1928 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他们是形影不离的“小朋友”。年轻的萨特当时不问政治,后来却成了政治参与义务的大理论家。而雷蒙·阿隆则已经开始关注政治,并且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和平主义。

两人都曾旅居德国,这段经历给了他们不同的收获,不过,真正使他们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阿隆去了伦敦,在那里他为《自由法兰西报》撰稿。萨特的抵抗活动虽然不如他的信徒们所说的那么辉煌,但他也遭受过被俘和战败的打击,并且在几次知识分子的抵抗活动中获得了参与抵抗的经历。1945 年,在他所创办的《现代》杂志(阿隆曾有一段时间和该杂志合作过)第 1 期上,萨特提出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理论。他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媒体很快把“存在主义”和圣-日尔曼-德-普雷区的活跃思

想联系起来；萨特的著作被大量印刷，他的剧作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不久，冷战将世界一分为二，法国知识界也受到了影响。起初，萨特遭到共产党的猛烈抨击，可他和后者逐渐接近，甚至在1952—1956年间成了该党的“同路人”。而在雷蒙·阿隆最为著名的评论著作之一《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里、在他对专制现象的思考中，他所揭露的恰恰是共产党知识分子和该党的“同路人”。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萨特和阿隆是一对敌对的兄弟，他们代表和象征着知识界两大对立的派别，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行将结束的殖民战争和越南冲突上，同样也反映在1968年的五月危机中：萨特支持学生运动，而在极左派的眼里，阿隆是“资产阶级”教育界和被羞辱的自由主义政治的代表。

不过后来，正是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身份给了雷蒙·阿隆声誉和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法国知识界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危机，极左派的思想楷模和大师都遭到了贬斥，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也迅速削弱。1980年萨特去世，此后他经常被攻击。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优势地位的体现，可现在，他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左派错误和失败的罪魁祸首和象征。与此同时，雷蒙·阿隆在他1983年去世以前甚至以后，得到了他的同胞们的广泛承认，被看成是自由主义浪潮的一分子。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法国里尔第三大学教授，先后通过法亚尔出版社出版了《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高等师范的预备生和正式生》（1988年）、《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1990年）等著作，并领导编写了《法国右派史》（伽利玛出版社，1992年）和《20世纪法国政治生活历史词典》（法国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

引子

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的故事理所当然地从一张 71 年前拍摄的、已经泛黄的照片开始。照片上，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1924 级文科班的全体学生摆好姿势，合影留念，以示后人。在第一排，肩并肩地坐着两位选择了哲学专业的年轻人：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前者手持烟斗，头戴宽边帽，衣着中流露着一个狂放不羁的学生对世界的怀疑。与他相反，后者西装的口袋里插着用做装饰的小手绢，腿上还套着护腿套。两人的穿着已显不同风格，而它们与刚考进的学校之间的关系也截然不同。与此同时，这张照片还可能使人们形成一种危险的偏见，因为这两位师范生的对比显然不仅仅限于他们的衣着。

与其以一张照片,我们还不如以一则与照片同时代的诺言为出发点。在乌耳姆路¹,萨特和阿隆曾以开玩笑的方式相互约定:两人谁活得更久,谁就要为先去世的另一位撰写传略,刊登在高等师范校友的《年报》上。然而,几十年过后,当 1980 年 4 月,两人中的一位与世长辞时,另一位却在一篇诚挚而悲伤的文章中写道:“诺言已不复存在了。”² 与其说作者的笔墨反映了他的敏感和伤痛,不如说是证明了历史在他们两人之间挖就的鸿沟。我们不得不看到,在与他们那个时代³ 的关系方面,萨特和阿隆这一代人生活得非常艰苦。此外,根据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写的最著名的两篇回忆文章,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与历史接触的这种严酷性。保尔·尼赞⁴ 和罗贝尔·布拉齐亚克⁵ 分别在《亚丁·阿拉伯》和《我们的战前年代》中指出,20 世纪 20 年代的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远不像瓦拉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是锤炼学生们人生路线的熔炉。这些学生们的人生路线是对立的,后来又是悲剧性的: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尼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死于德军的枪弹;而布拉齐亚克则是莫拉⁶ 的追随者,他逐渐被莱茵河彼岸⁷ 的意识形态所诱惑,最终在同一次大战中死于法国人的枪下。

当然,如果我们把那一代师范生全都看成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或莫拉的追随者,那我们就错了。大家将会看到,政治重心并不在这里。不过,我们对那一代人悲剧历史⁸ 的印象依然是正确的,他们同 20 世纪一起诞生,却异常幸运地逃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难,若他们年长几岁,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他们的历史完全不像风暴前后的那种平静。20 世纪 30 年代,战争的威胁与日俱增,接着,法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军占领的考验,这一切都构成了知识分子们所要面临的第一群暗礁,在高等师范学校的预备班和正式班中,萨特和阿隆有许多同学都

触了礁,他们的命运因此而被击碎。就这样,在某种程度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内部发生了一次大换班,一群四十多岁的人在法国解放后接替了他们的前人,迅速站到了前台,萨特也很快成为这群人的象征。但是,历史这时很快又开始了它的进程,先是东西方关系破裂,接着是殖民地的独立战争,这些事件在知识分子中间划定了一条新的分界线。萨特和阿隆的友谊,就是破裂在这第二群暗礁上的。不仅如此,两人后来分别成了相互对立的知识分子新阵营的领袖。

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的名字以后逐渐成为 1905 年左右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些知识分子之间曾经接连发生过好几次决裂。在这一系列决裂的过程中,留给友情的机会最终微乎其微。正如年过半百的雷蒙·阿隆在 1956 年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任何友谊都没能战胜政治观点的分歧,为了避免分道扬镳,一些朋友不得不同时改变政治立场,这种情况既情有可原,又值得悲哀。”⁹

在这里,上述关于一代知识分子含义的插叙,对于解释萨特和阿隆的政治选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充满了许多其他的决斗,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只不过萨特和阿隆刚好同岁,他们曾是朋友,而且毕业于同一所学校。他们各自穿越了这个世纪,因此,对他们这段历史的比较并不局限于他俩破碎的友谊——这种现象无论在知识界和还是在其他场合,毕竟都十分常见——它同样也为震撼知识界的惊涛骇浪定了位。除此之外,自从这两位昔日的朋友爆发论战之后——这场论战持续了 30 年——他们就从未在同一时刻、在同样广泛的范围里产生过影响。我们将会看到,两个人在影响力上的这种差异,是 20 世纪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各种思想体系在不同阶段的反映。

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不能仅仅把他们两人说成是政治风浪

或个人影响力大小的体现。他俩的历史客观存在着,这既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人格,也是因为他们很快就成了各自阵营的代表人物。而且,这使我们感到,面对一个蕴涵如此丰富的主题,有必要指出四个在研究中应注意的地方。首先必须提醒大家的是,尽管本书涉及的历史在时间上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它已属于另一个时代,一个“图片影响”(雷吉·德布雷¹⁰语)尚未到来的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们通过辩论,在涉及整个国家的大规模论战中寻找成功的机遇。我们必须努力追溯过去,更何况那时,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道德信誉和影响力,早已随着一些主要综合性思想体系的瓦解而分崩离析了。

这种情况不仅仅扰乱了历史的背景。当时,萨特和阿隆的角色也发生了名副其实的互换:萨特逐渐退入幕后,而晚年的阿隆则被推上前台。他俩的地位也有所变化:很久以前,萨特就被推崇为权威人物,但是此后,当人们回过头来看他的时候,他却成了他的对手们所说的不识时务的算命先生,总是作出不合时宜的判断和预测。于是,这种迟到的角色互换引发了一场关于两人形象的真正的争吵,只是形象破坏者们的身份和年龄已起了变化。这构成了这项研究的第二大困难,也是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原因之一。仔细想来,让-保尔·萨特的命运其实非常奇特:经过从法国解放到 70 年代中期三十多个光芒四射的年头即“萨特时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尸骨未寒的萨特的孤立。这种名誉谋杀早已为知识分子们所习惯,然而,除此之外,五十多年来的确存在着一个“萨特问题”:一颗曾经照耀人们思想的太阳,沦落为暂时或永远熄灭了的恒星,这一转变是知识界星转斗移及其判断标准改变的最为实在的标志,换言之,它表明,在知识界内部也存在着名副其实的哥白尼式的天体运行规律。当然,还有其他的标志,那就是雷蒙·阿隆

晚年及身后所得到的荣誉,因此,他的命运也同样奇特。我们在前文中一直强调,两人各自不同的形象,是多次震撼法国社会和主导思想的辩论的体现,这些主导思想曾一次又一次为许多人的共同疑问提供了答案。

既然如此,拘泥于对他们两人作照镜子式的对比分析,将会是一种带有很大局限性的方法。他俩为自己而存在,各自走过了自己的旅程,并在深思熟虑之后对社会政治问题负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们需要研究的,还应该是他们穿越历史的政治旅程。也就是说,他们各自对那个时代历史的思索,以及他们通过关注社会问题而直接同历史结下的关系。此外,阿隆公开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在他的一生中,与历史的接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在他《回忆录——50年的政治思考》(以下简称《回忆录》)的后记中,有一句被经常引用的话:“假设明天会有人不辞劳苦读我的文章,他所看到的将是我的分析、憧憬和疑虑,它们充斥着一个沉浸在历史当中的人的意识。”¹¹另外,历史对阿隆的影响同样也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最近有一篇博士论文明确指出,“雷蒙·阿隆是根据1930年以后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来确定他评论历史知识的哲学依据的”,而“同样是这些历史事件,决定了他对道德和政治两者间关系的认识”。¹²1965年1月15日,雷蒙·阿隆在归还道德与政治研究院院士的佩剑时,另外提到了1930年初他“在莱茵河边”度过的日子,他是这样说的:“在我狂热地阅读黑格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¹³的作品时,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计划:思考正在发生的历史。”¹⁴

研究萨特与历史的关系,乍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因为这种关系处在一个有争议的背景中。雅克·奥迪贝尔蒂¹⁵曾用以下漂亮词句来形容萨特:他是一名“出现在所有思想战线上的守夜人”¹⁶。毫无疑问,对这句话,哲学家萨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可

以各有各的理解。前者强调的,是“守夜人”始终不渝的警惕性,以及他在多次辩论中全身心投入的严肃态度。后者则指出,如果守夜人不顾现实,或者游离于现实之外,睁着双眼做梦;或者更糟糕一点,如果他是一个梦游者的话,那么只要他稍有闪失,就会产生危险。阿隆思考历史,萨特则梦想历史。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人们近来对萨特的指责是很重的,何况如我们所言,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以,列奥尼德·普里乌奇¹⁷在谴责法国知识分子在苏联问题上搞“自我催眠”的同时,发表了以下评论:“在我看来,萨特象征着这种精神的堕落,对真实的拒绝,以及在政治的梦想、背离现实的辞藻堆砌和华丽的演讲中对现实的逃避: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因为现实被掩盖了。”普里乌奇补充说,相反,“对于我和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加缪¹⁸的思想是悲剧性的,但是是勇敢的。加缪是真实,萨特是谎言”¹⁹。

萨特去世 15 年后,他的情况仍然具有强烈的感情蕴涵,对他的分析时常在赞美和抨击之间摇摆不定。但无论如何,在同历史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这种不公开的辩论对于年轻时代的萨特是毫无意义的:无论他是一个在压迫面前清醒而认真的守卫,还是一名不负责任的梦游者,这个问题只是在他成了一名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以后,才被提出来。不过,在开始关注政治之前,他在国民意识方面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睡期。此外,这种长时间不问政治的现象本身,也是历史所要研究的对象。要么是因为萨特还年轻,要么是因为历史对他没有吸引力。

萨特、阿隆、加缪,还有许多其他人,本书将提及一大批著名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尊敬和诋毁。不过,历史学家更为平淡的工作,是挖掘历史的片段并赋予其意义,而无权对某人脱帽致敬,或相反像法官那样对他严加审判。马克·布洛克²⁰曾

以强烈的言辞要求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家们：“支持和反对罗伯斯庇尔的人们，我们大声请求你们的恩赐，行行好，你们只要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谁？”我们是否也有可能静下心来，心平气和地就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提同样的问题——这里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而不使一些人绝望、另一些人高兴呢？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都希望凭良心工作，不愿从一开始就被怀疑打算为某些人歌功颂德，或相反对他们诽谤诋毁。不管怎样，这也是我们第三个最初的愿望。何况，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历史包含着很多意识形态的因素。此外，这部历史的字里行间还流露着对巨大的法兰西激情²¹的描述。所以，如果笔者在研究中稍有不慎，就会有把自己的位子拱手让给道学家的危险。

然而，撰写一部客观的历史而不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历史，并非易事，尤其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隆，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他俩浓重的身影笼罩着，尽管两人都已去世，但有时，他们仍然继续代表着新近知识分子历史的两大对立面。两位被研究的对象生活的年代距我们很近，这会使历史学家对他们产生亲近感。当然，辞源意义上的亲近感是必要的，它甚至是历史学家职业的本质。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和一些对象接触时间过长，一连几年不断地通过间接的资料和这些对象打交道，历史学家就会——这是他们的通病——对研究对象产生好感，或者（尽管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但更为严重）反感。历史学家不能否认这种危险的存在，而应该正视它，努力消除它。历史学家不是作最后决断的傅基埃－丹维尔²²，更不是对历史行刑的刽子手。从某些意义上来说，他的任务更像是预审法官。作为一名全体国民记忆的保管者，他把档案里的材料转交给他的同代人，由后者——如果他们

愿意——对这份经过预审的档案作出判决。

但是,这种判决必然取决于意识形态环境和某一时代的历史背景。长期以来,雷蒙·阿隆受到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排斥,这和目前让-保尔·萨特所经常遭到的严厉谴责一样,是一种极端。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采取某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和事佬态度。像萨特和阿隆那样具有很强号召力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有影响的,因此,尽管他们犹豫,也应负起责任,因为他们在公众面前的立场,会影响他们同胞的观点甚至是行动。所以,历史学家不应该责问知识分子,他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不过,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有什么权力给予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以某种不可侵犯的地位呢?这些知识分子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应该受到的不是历史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并不存在——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其著作及行为造成的结果所进行的理智分析。

大家将会明白,我们这里要写的不是一本知识分子必须向他们同胞汇报的流水账,而是一部穿越世纪的游记。因为萨特和阿隆是双重意义的世纪文人²³:他们没有选择远离尘世,以酝酿和雕琢他们的作品,相反,两人都融入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尽管这一选择是在不同时间作出的;于是,他们通过表明立场和参加辩论,接受了汹涌热烈的 20 世纪。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来说,分析他们穿越世纪的经历有双重珍贵的意义。一方面,这部历史尤其应该注意知识分子的参与过程:他们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其说可以在过于笼统的、试验性的思考中寻找,不如说应该通过对某些例子的细致研究来求得解决,此外,这种例子可能会有很多,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当承认,萨特和阿隆的情况是远远不容忽视的!

当然,我们选择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就要承担这种选择带来